

后现代与知识分子 社会位置

HOUXIANDAIYUZHISHIFENZISHEHUIWEIZHI

王增进 著

- 95 -
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现代与知识分子社会位置 / 王增进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7

ISBN 7-5004-3758-7

I. 后… II. 王… III. 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研究 IV. D0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57784 号

责任编辑 陈振藩 雁 声

责任校对 尹 力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盛华印刷厂

装 订 海东装订厂

版 次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5.25

插 页 2

字 数 160 千字

印 数 1—3500 册

定 价 1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如果说中国目前已步入后现代，估计没多少人相信。但毫无疑问，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已经出现一些后现代因素：科学技术核心地位的确立、知识产业的崛起、互联网的普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消费时代的来临……后现代化与现代化进程结伴而行，这大概是当今后发现代化国家不得不面对的共同命运。现代化离不开知识分子，而后现代因素的介入使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位置发生了某种扭曲、变异。现代化的召唤与后现代的平面化使知识分子（主要是人文知识分子）在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面前进退失据。可见，在当前中国，“后现代与知识分子”已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而这正是我对它感兴趣的主要原因。

但感兴趣不一定就要写书，就像一个人对小说感兴趣可以去看小说，却不一定非要写小说一样。促使我撰写本书的直接动因并非兴趣，而是我在阅读有关“知识分子”和“后现代”的文献过程中，对学术界长期存在的游谈无根有了更深切的认识。正是这种游谈无根使我感到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游谈无根的第一个表现是文献中存在大量的知识性错误，或者说有违事实之处。依据事实说话，这似乎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失去了事实的支撑，思想便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不幸的是，学者们在讨论“知识分子”和“后现代”问题时，对自

已引以为据的“事实”常常是信手拈来，不加必要的查证便宏论迭出。比方说，在涉及“知识分子”词源的时候，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如下的说法（未注明出处的为学界公认的说法）：

（1）“知识分子”一词有法语和俄语两个源头。

（2）法语中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el）一词最早由老虎总理克里蒙梭于1898年德雷福斯事件中使用。

（3）左拉于1898年初写了一封题为《致共和国总统》的信，《曙光》报主编克里蒙梭将这封信的标题改为《知识分子宣言》，从此，“知识分子”一词逐渐为人熟知。（邵建：《“枭鸣”的猫头鹰——知识分子肖像》，《北京文学》，1999年，第2期）

（4）左拉于1898年1月14日在《曙光》报上发表了《我控诉》一文，同一天，克里蒙梭以《知识分子宣言》为标题撰文评价《我控诉》，“知识分子”一词由此诞生。（陈乐民：《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闲话知识分子与治学》，载《读书》1994年第1期，第30—31页）

（5）法语中的“知识分子”一词首度出现于1898年1月23日之《曙光》杂志中左拉等人所写的一篇文章。（许纪霖：《关于知识分子的系列思考》，载《东方文化周刊》第6—16期；黄平：《知识分子：在漂泊中寻求归宿》，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总第2卷）

（6）俄语中的“知识分子”（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一词最早由小说家博博雷金于1860年代使用。

（7）法语和俄语中的“知识分子”最初均用来指那些对社会现状不满的学者或文人。

每当看到这些“有鼻子有眼”却似是而非的说法，特别是看到这些说法出自该领域“名家”之口时，我便不禁愤怒：凭什么这么说？您查资料没有？

也许有人会说：你列举的这七条当中，大都只是关于“知识

分子”一词由何人首先使用、何时使用、何处使用的细枝末节问题，无关宏旨。其实不然。我认为，澄清“知识分子”一词由何人首先使用、何时使用、何处使用，是知识分子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基础环节，如果在这一环节出错，势必会影响对“知识分子”一词的理解、界定、分类以及进一步的讨论。退一步讲，即使这些错误对某项具体研究而言真的无关宏旨，但作为以“探求真理”为使命的学者，您有什么权利将这些错误信息传给读者？这种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的态度是学者应有的态度吗？

至于上面问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我在本书第一章已有详细的阐述，此处只简要订正如下：

(1) “知识分子”一词实际上有三个来源：英语、法语、俄语。从字面上看，该词含义显然与“智力”、“理解力”有关，指那些“智力水平高”、“理解力强”的人，而这一字面义或者说基本义则源于英语的 *intellectual*。俄语中的“知识分子”（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来自波兰语，19 世纪才产生；法语词“知识分子”（*intellectuel*）开始作名词用也是在 19 世纪。而英语中作人称名词用的 *intellectual* 早在 17 世纪中叶就出现了，意思正是“智力水平高的人”、“智者”。此后，随时代更迭“知识分子”的词义也有变化，但直至今日，“智力水平高的人”仍是它的基本义。学者们考察“知识分子”的源头，可奇怪的是，竟忽视了考察其“基本义”的源头，只考察该词所含的“对现实不满”、“批判”、“反叛”等次生义的源头（这大概与做此考察的学者本身大多是批判知识分子有关）。换言之，当他们说“‘知识分子’一词有两个源头”时，实际上说的并非“知识分子”一词的源头，而是“知识分子”一词的某一含义的源头。

(2) (3) (4) (5) 法语中的“知识分子”一词并非最早出现于德雷福斯事件中，早在 1845—1846 年，哲学家雷南（Renan）使用过该词。1864 年，哲学家勒努维耶（Renouvier）及小说家巴

尔贝·都尔维利 (Barbey d' Aurevilly) 也用过该词。在始于 1894 年的德雷福斯事件中, 第一个使用此词的是克里蒙梭, 时间是 1898 年 1 月 23 日。左拉于 1898 年初写了一篇《致共和国总统的信》(LETTRE AU PRESIDENT DE LA REPUBLIQUE), 《曙光》报主编克里蒙梭为醒目起见将其改为《我控诉……!》(J'Accuse……!), 发表在 1 月 13 日(而非 14 日)的《曙光》报上。未有任何证据表明左拉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使用过“知识分子”一词。

(6) 俄语中“知识分子”一词的最早使用者并不是博博雷金, 而是大名鼎鼎的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 时间是 1846 年, 恰恰与雷南首度使用法语词“知识分子”几乎同时。

(7) 尽管从指称对象上讲, 法语中的“知识分子”一词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主要用来指那些与政府和军方作对的德雷福斯支持者, 但该词的基本含义仍是指“智力水平较高的文化人”。反德雷福斯阵营的代表人物之一布律内梯埃 (Brunetière) 在 1898 年的一篇文章中说得明白: “有人最近创造了知识分子这个词, 用来指那些生活在实验室和图书馆里的个体。”(转引自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 洪洁译, 第 95 页,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俄语中的“知识分子”一词在 19 世纪也有多种含义。除用来指那些“坚持真理, 批判现实”的人之外, 还有“文化精英”、“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成员”、“上流社会”等意思。

读者不难发现, 到目前为止, 研究知识分子的书籍和文章已堆积成山, 但尚无一篇专门研究“知识分子”词源, 并做到出处明确、考据充分、结论可信的文章出现。大多数研究者在研究之始都要涉及“知识分子”词源问题, 告诉读者“知识分子”一词从哪里来, 是什么意思等等, 但他们的说法却是奇乱无比, 错误百出。

游谈无根的第二个表现是文献中存在着大量的逻辑错误。逻辑错误的种类有很多, 在“知识分子”和“后现代”研究中表现

最突出的是以下两种：

(1) 将“规定”混同为“判断”。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最大不同是，社会科学中的语词多是歧义迭出的语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同一个人在不同时候也会有不同的理解；而自然科学中的语词的含义是大家公认的，什么是小数？什么是电阻？大家的理解都是一样的。换句话说，自然科学研究者使用的基本是统一的概念体系，也可以说是用同一种语言说话，而社会科学研究者表面上看使用的可能是同一种语言（比如说汉语），但实际上是一个人一种语言。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科学研究者在研究之初必须要做的便是对关键词进行定义。但我们经常看到的情况是，许多研究者在研究中会跳过“定义”这一环节，一上来便开始大套大套的论述。定义的目的就是确定研究对象和基本理路，如果研究者在研究之初对其中的关键词不做定义，那就意味着自己研究对象的混沌不清和基本理路的错乱。这时，研究者针对某一关键词的叙述（无论这种叙述是多么精彩）实质上不过是对此关键词的“规定”，而非“判断”。“判断”有正误之分，而“规定”则没有。例如，有的研究者在未对“知识分子”一词进行定义的情况下，宣称“只有像顾准、陈寅恪那样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才称得上是知识分子，而趋炎附势如×××之辈则不配这一称号”。研究者有这样说的权利，但是，如果他前面没有对“知识分子”一词予以明确界定的话，那么，他这句话的意义无非是：他规定“只有那些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才配得上‘知识分子’的称号”。也就是说，表面上看他下了一个“顾准、陈寅恪是知识分子，×××不是知识分子”的判断，而实际上不过是做了一个“顾准、陈寅恪是知识分子，而×××不是知识分子”的规定。再比如，有人指出“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边缘化，因为他们的言说不再受大众关注、不再具有轰动效应了”。倘若作者前面未对“边缘化”进行明确界定，那么，他

这句话其实仅是做出了这样一个规定：只要知识分子不再受大众关注（而不管其经济收入如何、政治地位怎样），那么，他们便处于边缘化状态。还有人说“后现代是现代的一部分，是现代的成熟形态”，同时也有人说“后现代是一个完全超越现代的崭新历史阶段”。这两句话同样只是规定而已，并非判断。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就会看出，有关“知识分子”和“后现代”的文献中充斥着类似的“规定”。但不幸的是，这些“规定”的作者大都不认为它们是“规定”，而将它们混同为“判断”，以为自己有了什么了不起的发现。而其他研究者也往往将它们视为精辟的“观点”或“判断”加以引用，加以推介。

（2）自相矛盾。自相矛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对关键词不予界定导致的。对关键词不予界定，实际上为叙述中的胡乱界定、自相矛盾的界定埋下了伏笔。这极容易使研究对象变成一堆泥，想捏成什么样就捏成什么样，或者说极容易导致陈寅恪所说的“呼卢成卢，喝雉成雉”。我手头有一个现成的例子，那就是著名知识分子问题专家许纪霖的一篇文章，叫《关于知识分子的系列思考》，发表于1999年的《东方文化周刊》第6—16期。看得出，这篇长文是作者辛勤思考所得，在知识分子研究中也的确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我不得不指出，这篇文章实是逻辑混乱的典型之作。作者在文章中分析了现有的“知识分子”的各种定义，唯独没有给出自己的定义。这直接导致了他在论述过程中大量的自相矛盾。例如，作者说“从古代到中世纪，知识分子实际上都依附在另外一些系统之中”，又说“知识分子的真正独立，还是近代以后的事情”，由此可知，知识分子在近代之前便已存在，只不过那时是不“独立”的知识分子，近代之后是“独立”的知识分子。但作者又说“欧洲的教士和中国的士大夫，都是知识分子的前身”，这等于说“欧洲的教士和中国的士大夫”尚不是知识分子，亦即“近代”之前尚不存在知识分子。作者所说的“知识

分子”，通篇几乎都指的是“人文知识分子”，但在谈及知识分子要具有专业性的时候，忽地又把“生态学家”拉了进来。整篇文章中，“知识分子”一词频频出现，但其所指却是千变万化，互相矛盾。再比如，作者说公共性的丧失、边缘化、后现代崛起是对“原来意义的知识分子”的三大挑战，又断言“原来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已经“死亡”。这就是说，上述三大挑战是针对一个已经“死亡”的群体的挑战，而并非针对“现在的知识分子”的挑战，既如此，那又为什么要讨论“现在的知识分子”如何回应这些挑战呢？

我上面列举的游谈无根的两种表现绝不是个别现象，甚至可以说是普遍现象。读者可以任意找出一篇有关“知识分子”或“后现代”问题的文章，进行一番“脱水”处理，也就是将其中的知识性错误和逻辑错误以及建立在这二者基础之上的所谓“思想”“脱”去，其结果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

学术界评价一个人有没有水平，有一个不成文的尺度，那就是看他有没有“思想”。但在我看来，“有思想”不见得是件好事，如果是以被歪曲的事实和错误的逻辑为基础阐述所谓的“思想”，那么，这样的思想不仅毫无意义，还会误导、贻害他人。与其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花在阐述这样的思想上，不如老老实实在地将其花在厘清事实真相或概念含义上。

正是出于以上考虑，我在本书中对学界向来忽视的事实考证、语词梳理给予了格外的重视。比如“知识分子”词源问题，由于有关文献中错误实在太多，所以，我将它单辟一章，且是篇幅最长的一章。在这一章，我不厌其烦地对“知识分子”的形义源流进行详细的辨析和订正。读者也许觉得有些繁琐、枯燥，但我认为是值得的。这一章的考据虽不敢妄称彻底，但的确发现、纠正了目前存在的不少谬见。该章是笔者最着力、也许是最有价值的一章。后面几章，我又对“知识分子”、“后现代”、“中心”、

“边缘”等关键语词进行了具体、明确的界定。我说“史前时期即有知识分子”、“后现代知识分子不会消亡”以及其他有关知识分子社会位置变迁的结论，都是以这些界定为基础的。

我早就有这样一种认识：假如一个人所用的概念体系是明确的，那么，他在论述过程中犯错误的可能性并不大；反言之，假如一个人的论述让人觉得错误百出，那多半是由于他所用的概念没有界定清楚。概念是“格物”，思想是“致知”。思想的精辟往往源于概念的独到，思想的广泛传播往往表现为概念的广泛传播。这一点，只要想想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概念的重要意义便一清二楚了。

所以，我希望本书中的点滴“思想”有助于对有关问题做进一步的研究，但更希望本书的知识性考证和语词界定工作能引发方家的指教。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章 “知识分子”词源考	(1)
一 西方“知识分子”的三个源头	(2)
(一) 法语词“知识分子”(intellectuel)	(2)
(二) 俄语词“知识分子”(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6)
(三) 英语词“知识分子”(intellectual, intelligentsia)	(9)
二 汉语词“知识分子”形义考辨	(11)
(一) 汉语词“知识分子”何时产生?它是一个 “外来词”吗?	(11)
(二) 汉语词“知识分子”是怎样产生的?	(14)
三 此“知识”非彼“知识”:“知识分子”对译 与选择	(19)
(一) 汉语词“知识分子”与西语有关诸词 之比较	(19)
(二) 汉语与西语的对译:“知识分子”还是 “智识分子”?	(22)

第二章 “知识分子”的定义和分类	(29)
一 “知识分子”的定义	(29)
(一) 在给“知识分子”下定义时必须注意的 两个问题	(29)
(二) “知识分子”的“三 I 定义”	(33)
二 知识分子的分类	(37)
第三章 “后现代”的界定	(41)
一 “后现代”含义解读	(41)
(一) 用来指一种艺术风格	(44)
(二) 用来指一个时代	(47)
(三) 用来指一种思维模式或思想风格	(48)
二 笔者理解的“后现代”	(49)
第四章 后现代之前知识分子的社会位置变迁	(56)
一 中心或边缘的判定	(56)
二 史前时代知识分子的社会位置	(59)
三 前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位置	(67)
四 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位置	(77)
第五章 后现代与科技知识分子	(88)
一 后现代对科技知识分子中心位置的威胁	(88)
(一) 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	(89)
(二) 后现代思想家对科学技术的批判	(95)
(三) 科学技术的“减魅”	(98)
二 为什么科技知识分子在后现代仍会 居于中心位置	(99)
(一) 科学技术的作用更加重要	(100)

(二) 科学技术方面的“文化鸿沟”依然存在	(102)
第六章 后现代与人文知识分子	(106)
一 人文知识分子:需要,但其重要性不比从前	(106)
二 “文化鸿沟”的消弭	(112)
三 “文化鸿沟”的消弭与人文知识分子的 “祛魅”	(115)
第七章 小结	(126)
附录 后现代与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身份危机	(136)
一 后现代:伪问题还是无可回避的现实?	(136)
二 批判:人文知识分子的千年之痒与身份确立	(139)
三 现代化:我要“批判”	(141)
四 后现代:我为什么要“批判”	(143)
参考文献	(149)

第一章 “知识分子”词源考

在学术界，“知识分子”一词的含义向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深刻理解并合理界定“知识分子”，学者们一般都要对该词的词源做一番回顾与交待。这几乎成了所有“知识分子”研究者不约而同的第一道工序。因此，“知识分子”词源问题在知识分子研究中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

在西方，自 19 世纪下半叶以来，“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特群体，在历次社会革命、战争、学生运动及其他各种社会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与此同时，“知识分子”成为社会学家、哲学家研究的重点对象之一。

在我国，“五四”迄今，“知识分子问题”也一直受到学界的格外关注。“五四”时期及 20 年代，李大钊、张东荪、瞿秋白、鲁迅等曾就“知识阶级与劳工关系”、“知识阶级的历史作用”等问题展开过讨论；30 年代的胡适、40 年代的费孝通也发表过关于“知识阶级”的文章。改革开放以后，“知识分子的人格”、“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使命”、“民族主义与知识分子”、“后现代与知识分子”等先后成为知识界讨论的热点。

然而，令人深感遗憾的是，学者们在为我们提供许多发人深省的精彩观点的同时，也犯下了不少知识性错误，集中体现在“知识分子”的词源问题上。如大文豪鲁迅就曾说过，“知识阶级”一词是俄国作家爱罗先珂于 1922 年首先使用的，却忘记了

早在 1919 年我国学界就展开过一场关于“知识阶级与劳工关系”的大讨论。再如，研究者一般认为，“知识分子”一词有法语和俄语两个源头；法语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el）一词最早由老虎总理克里蒙梭（Clemenceau, Georges）于 1898 年的“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中使用；俄语的“知识分子”（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一词最早由小说家博博雷金于 19 世纪 60 年代所用，该词产生之时，即含有“对现状不满”、“批判”、“反叛”之意；汉语词“知识分子”是一个外来词，译自英语的 intellectual；汉语词“知识分子”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末才出现；等等。其实，这些皆是想当然的谬见。可以说，在上述学者们的众多研究中，真正就“知识分子”一词的形义渊源进行深入、耐心的资料采掘，做到出处明确、考据充分、结论可信者极为少见；相反，浅尝辄止、似是而非、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的情况却比比皆是。为消除这种“知识分子”研究上的“知识性混乱”，笔者查阅了大量资料，对上列种种错误说法进行了一一考辨和订正。

一 西方“知识分子”的三个源头

如果我们同意现在常用的“知识分子”一词不仅具有“社会现实批判者”、“体制反叛者”等“反面”含义，还具有“文化水平高”、“理解力强”等“正面”含义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西方的“知识分子”一词除法语、俄语两个源头外，尚有“英语”这一从未被人意识到的第三个源头。

（一）法语词“知识分子”（intellectuel）

学术界公认的看法是，法语中的“知识分子”一词——intellectuel 是“知识分子”的源头之一。谈到“知识分子”的词

源，研究者一般都会追溯 intellectuel 的产生过程。

多数学者认为，作为名词的 intellectuel 最早由克里蒙梭于 1898 年德雷福斯事件中使用。实际上，这一看法与事实不符。早在 1845—1846 年，哲学家雷南（Renan）就曾在他的一部手稿中使用该词。不过，这部手稿直至 1906 年才公开出版^[1]。1864 年，哲学家勒努维耶（Renouvier）用过此词；小说家巴尔贝·都尔维利（Barbey d’Aureville）在《图师的骑士》（Le Chevalier des Touches）一书中也用过该词^[2]。巴雷斯（Barrès, Maurice）在 1894 年 9 月至 1895 年 3 月间主持《帽徽》（La Cocarde）杂志时也使用过这一名词，意指对社会体制不满的作家、前卫艺术家、无政府主义者及社会主义者^[3]。由此可知，intellectuel 一词的实际最早使用者是雷南。若以公开发表计，则最早使用者为勒努维耶和巴尔贝·都尔维利。巴雷斯则是第一个将 intellectuel 与“对政府不满”和“反社会”联系起来的人。

始于 1894 年的德雷福斯事件使 intellectuel 一词逐渐流行开来。1894 年底，法国军事法庭在证据并不充分的情况下，以间谍罪和叛国罪判犹太军官德雷福斯无期徒刑并革除军籍。自此，围绕这件事，法国全社会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之中。由于德雷福斯是犹太人，所以军方、政界乃至不少普通百姓均对其抱有强烈的民族敌意，认为其罪有应得，这些人构成了强大的反德雷福斯阵营。而另一方面，以左拉（Zola, Emile）、克里蒙梭等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学者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为德雷福斯辩白。intellectuel 一词正是在这场争论中被广为人知。如今，对 intellectuel 一词在德雷福斯事件过程中最早由谁使用、何时使用，学术界的说法可谓五花八门，真伪难辨。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种：

1. 左拉于 1898 年初写了一封题为《致共和国总统》的信，《曙光》（L’Aurore）报主编克里蒙梭将这封信的标题改为《知识分子宣言》（Manifeste des intellectuels），从此，intellectuel 一词逐渐

为人熟知。^[4]

2. 左拉于 1898 年 1 月 14 日在《曙光》报上发表了《我控诉》(J' Accuse)一文,同一天,克里蒙梭以《知识分子宣言》为标题撰文评价《我控诉》,intellectuel 一词由此诞生。^[5]

3. 左拉于 1898 年 1 月 14 日在《曙光》报上发表了题为《知识分子宣言》的文章,这是最早使用 intellectuel 的例子。^[6]

4. intellectuel 一词首度出现于 1898 年 1 月 23 日之《曙光》杂志中左拉等人所写的一篇文章。^[7]

5. 左拉发表《我控诉》的第二天,一些学者、文人、艺术家、记者、学生等联合签名,发表了一封抗议信,声援左拉,呼吁德雷福斯一案重审。这封抗议信,后被巴雷斯撰文称为“知识分子抗议书”,intellectuel 一词旋即风靡起来。^[8]

上述说法个个言之凿凿,但又相互矛盾。笔者查阅了大量有关资料,试图对 intellectuel 一词在德雷福斯事件中被使用的来龙去脉进行彻底的梳理和廓清。据考,可以肯定的是:(1)左拉所发表的文章的真正标题是《我控诉……!》(J' Accuse……!),而非《我控诉》;副标题是《给共和国总统的信》(Lettre Au President De La Republique)。《耶路撒冷邮报》(The Jerusalem Post)上刊有当天《曙光》报的照片,清楚标明这一点。^[9](见第 5 页图)笔者认为,“我控诉”后面的省略号和感叹号不能省,左拉使用这两个标点符号显然有其用意,省略号表示“控诉”的罄竹难书,感叹号表示“控诉”时的义愤填膺。尤其是文章标题,我以为应忠于原初的文本。(2)左拉文章的原标题是《给共和国总统的信》,发表前,为醒目起见,克里蒙梭将其改为《我控诉……!》,而不是改为《知识分子宣言》。^[10](3)左拉的《我控诉……!》发表于 1898 年 1 月 13 日,而非 14 日。这可以从法国史方面的权威著作《1814 年以来的法国政治和社会》一书中看出来。^[11](4)左拉的《我控诉……!》全文中从未使用过 intellectuel